

语境对构式语义的影响

An Analysis of the context effect on constructions

田 禾

Abstract : Coming from its prototypical usage, a construction formed gradually with the high frequency in everyday use. Different contexts can provide necessary condi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also can be changed by the speaker in order to make the construction to be a strategy in communication.

Key words : context/ 语境 homographic constructions/ 同形构式
communication strategy/ 交际策略

1. 引言

第二语言学习者与母语者相比在对句子的理解和运用上往往有很大差距。郝墩(2018)的研究结果证明,虽然二者在理解汉语句子时都受到动词和构式的两方面的影响,但相比之下,“构式在母语者句子理解中更加重要”。这说明,学习者对汉语句子的理解误差主要在于拘泥于个别词语的语义,而未能把握由句子整体结构带来的超越一个个单个词语的语义集合的构式义。比如下面这种情况虽然两组对话中出现完全相同的句子,但学习者对于第二组往往理解不了其中的反话语气:

1) 甲:怎么又不说话了?想什么呢?

乙:哦,我在想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事儿先跟王头儿说一声儿。

2) 甲:王头儿?告诉他还不等于告诉了所有人!想什么呢?!

乙:也是哈。

显然，在第一组对话中出现的“想什么呢？”是一般问句，而第二组的同样句子只是说话人的主观情绪的表露，并不是问句。像这样由相同词语组成的形式相同而在不同语境中表达不同语义的句子并不少见。本文尝试从语境的角度探讨不同语境如何影响构式最终语义的实现，也就是侧重观察外部因素对构式内部的影响。

2. 构式对语境的依赖与语境对构式语义的影响

2.1 构式义的产生

诸多研究指出，构式义的产生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不同构式所原本具有的分析性（analysability）和组合性（compositionality）的丧失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不管是词还是句子，有一些完全脱离了原本的结构组合所呈现出来的语义，而产生了新的意思。

比如“吹风”，在句子“你也跟他适当地吹吹风。”中的语义既不同于在句子“到外边吹吹风凉快凉快。”中的“吹风”，更不同于“吹风机”中的“吹风”。词组或句子语义的产生首先取决于组成句子的词语和句子结构，之后通过隐喻或者转喻等契机，关键词语的用法产生变化，造成词汇组合或句子组合的变异。就拿“吹风”来说，原本的语义是指从耳边自然吹过一阵风，使人有意无意受到影响。而隐喻的联想产生主动影响他人的“吹枕边风”，进一步独立出来固化为透露消息的语义。“吹风”构式义形成之后，在具备语境 {甲跟 / 向乙吹风} 时呈现出透露消息的语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构式成功脱离原本的组合语义而整体提取出新的语义可能来自于两方面的作用力。一个是内部组件的搭配，另一个是外部语境的共现。

2.2 构式对语境的依赖

语义的产生与使用频率也密切相关。杨黎黎、汪国胜（2018）认为，“频率对构式的影响是通过语境、图示性、组合性和分析性来实现的。”并指出，“内部组件的共现频率搭配强度影响着构式的固化¹⁾”。杨、汪文中通过三组近义词组的对比，发现

1) 原文注释说：“固化”是认知语言学所用术语 entrenchment，见于 Schmid (2010)，在 Bybee 的

各自对语境的依赖程度不同。“置消费者的利益于不顾”这样的〔置 NP 于不 V〕是不依赖语境可以独立使用的；“放着舒舒服服的好日子不过，倒要去受苦。”这样的〔放着 NP 不 V〕依赖语境，只能作为从句使用；还有一种是“放在文革时期，他早就被劳改了。”这样表虚拟语气的〔放在 NP〕也依赖语境，是个跨小句构式。后两个显然对语境的依赖度很高，需要其他分句的出现才能表达完整的语义。该文针对构式语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所做的分析在诸多方面都很值得借鉴。不过，反过来从语境对构式语义表达的影响来看，即使是第二类〔放着 NP 不 V〕虽然说如果没有后续小句确实语义不够完整，但是后接小句并没有对该构式这部分的语义表达产生影响，也就是说，不管后边的语句如何，〔放着 NP 不 V〕本身的构式语义没有发生变化，本质上跟第一类相同。只有〔放在 NP〕这一类，会因为后续小句的存在而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放置义的虚拟语义。这样看来，语境对构式语义的影响并不等同于构式对语境的依赖。

2.3 同形构式

过国娇、陈昌来(2016)对同形构式〔一 +M 借 +VP〕的语义分化进行了全方位分析,发现“该构式内部已分化出‘快捷义’和‘反差义’两个同形构式”。比如副词“突然”可以出现在表快捷义的“胖妞还没进包房(突然)就被一拳打了出来。”而无法出现的表反差义的“在蝗虫密度最大的地方,(突然)一脚能踩死几十头。”这样的句子里。过、陈文的结论是在具有“事件的发生超出说话人的心理预期”这一共同语义的基础上,导致语义分化的内在动因“主要是认知主体对意象图示不同成分或关系的突显”。众所周知,认知语言学所说的“凸显”²⁾就是指说话人根据发话意图而使某信息成为“图示”而另外的信息则作为“背景”。具体到语句中是通过语境的适当提供来实现的。也就是说,至少对于同形的两个构式来说,说话人的意图以及由此提供的与话语目的相适应的语境会影响同形构式的语义倾向,从而在同形的两个构式之中选择最适当的形义配对。那么,首先不妨从说话人的意图出发来考察构式语义的最终实现。

术语中是词汇强度 (lexical strength), 均表达一个结构经过多次反复使用而整体化植根于人脑的记忆当中。

2) the prominence view 通常译为“凸显观”。

3. 发话意图对构式语义的影响

3.1 语用条件的有意图变更所产生的影响

前文中提到的“想什么呢”，原本是个疑问句，而实际语料显示，作为反问句使用的情况也常能看到。疑问句的“想什么呢”与反问句的“想什么呢”也是一组同形构式，其疑问或反问构式语义得以呈现的首要原因是构式的疑问功能的隐现。

从语用角度来看，使用疑问句的最基本的发话目的是询问新信息。例1)中发话人提出问题，对方做了回答。而在例2)场景中发话人已得知相关信息之后仍然使用同样的句子，这就使疑问句的疑问功能无用武之地，从而启动了疑问句的反问功能。而听者也根据第二个场景的先答后问的语境得以判断出发话者的意图，放弃了再次回答。至此，非疑问“想什么呢？”构式依靠语境被激活，构式义在对话中成功传递并接受。如果发话人不知道“想什么呢？”有同形的非疑问构式，就不可能在除了疑问以外的场景中使用同形的句子，也不可能被听者正确解读。合适的语境中使用形义匹配的构式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这一构式在典型语境中的使用频度足够高，能够在该语言的使用者之间达成共识语义。也就是说，从原型用法演变而来的同形构式首先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固化。汉语疑问词都有除了发出疑问以外的非疑问功能。比如：

3) 甲：*谁知道他去哪儿了？*

乙：我看见他出校门了。

4) 甲：他去哪儿了？

乙：问我干嘛？*谁知道他去哪儿了？！*

5) 甲：他去哪儿了？

乙：*我怎么知道？！*

场景3) 4) 的同形构式分别为疑问和非疑问两种用法，在场景4)中，甲之所以向乙发问，是预设乙就是知道答案的那个“谁”，而针对甲的发问，乙不但没有提供答案，

反而用“谁知道”推翻了甲的预设,这种反逻辑的用法使“谁知道 VP”构式与同形的疑问构式区别开来,与非疑问“想什么呢?”构式的语义实现路径相同,非疑问“谁知道 VP”构式同样是依靠语境激活的。

同理,例5)“我怎么知道?”也是通过语境来激活其非疑问构式义的。甲向乙的提问成立条件是存在乙知道答案的预设,而乙不仅没有回答问题,反而用了向对方询问自己如何能掌握相关情报的反逻辑的问句,否定了甲的预设,使甲的提问显得很荒谬,从而附带上了较强的反问语气。与“谁知道 VP”构式相比,非疑问“我怎么知道?”构式的固化程度更高,实际语料显示,“我怎么知道?”已经完全失去了一般的疑问功能,只表反问,而担负疑问功能的句子要加上其他词语,比如“那我怎么才能知道呢?”,这样才能使句子的反问语气消失,呈现出通常的疑问语气。

含疑问词出现的非疑问构式有时在具体语境中被听者有意曲解,比如:

6) 甲: 几点了? 你还不起来!

乙: 你不会看表啊?

面对甲的抱怨,乙故意将其“几点了?”解读为通常的询问时间的疑问句,并以语气严厉的反问形式回应,以此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含有疑问词的构式伴随着语言使用者有意图的用作非疑问功能而在高频率使用中逐渐固化,形成了与原有疑问功能同形的新构式语义。发话者和听者对这一构式语义达成默契,在会话中如果说话人有意识地提供了非疑问的语境,就会使含有疑问词的构式语义得以实现。其实这个路径与“你跟他吹吹风”的“吹风”语义变异和功能拓展的情况是一致的。王晓辉(2018)对习语构式浮现(emergence)的研究指出,“习语构式一般是以原型用法为基础、在日常的频繁使用中逐渐浮现成型的”。并对原型字面用法和现有构式用法的并存现象解释为“形变滞后”影响的结果。

综观含疑问词的同形构式,原本的疑问用法和新的非疑问用法并存现象普遍存在,因此语境的适当提供才能使同形构式语义最终得以确认。由于具体构式使用频度的不同,固化程度也有所不同。频率效应(frequency)使构式分别在语符频率(token frequency)和语类频率(type frequency)的具体作用下,或是落实为某一具体

的构式规约化的完成形式，抑或是固化为某一类抽象的图式构式。上文所提到的“我怎么知道？”作为非疑问构式使用就是语符频率高所带来的高度固化的结果。而像这样语符频率高产生的一个特定构式反过来往往要求原型语义重新寻找新的构式承载。可以说，构式语义的分化从最初的语义变异和之后的功能拓展均来自使用者对使用条件的有意变更。

3.2 交际策略对构式语义的影响

会话中交际策略的运用往往会影响发话人对词语、句子、语气的选择。比如上文中提到的例6)，故意曲解对方话语意图是一种表达不合作态度的有效手段。如果针对同样的发话选取合作手段，乙可能采取下边这种应答：

7) 甲：几点了？你还不起来！

乙：今天是星期六，没课啊。

乙充分解释自己没早起的行为，将甲的问句解读为提示，远比同样场景的6)所采用的反问方式语气缓和得多。

如果乙以更积极的态度回应甲，还可能出现下边这样的回答：

8) 甲：几点了？你还不起来！

乙：八点了！坏了，要迟到了！

乙通过回答甲的问题，用这种方式去除了甲所发出的“几点了？”可能含有的其他语用功能，使之回归于通常意义的疑问句。这样一来成功阻止了甲有意图的责备抑或是提醒，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曲解”。从乙可能发出的三种不同的对应来看，即便是甲发话时的用意是非疑问的构式，也会因为乙的语境提供而使其仍然以字面的原型语义保留在会话中。

当然也有的构式不管对方怎样尝试去除现有的构式语义也都无法使其限定在原型的字面语义上，如“我怎么知道？”，这种构式语义是语频效率三大效应之一的自治效应的产物。根据盖淑华（2011）的整理，语频效率主要有保护效应（conserving

effect)、自治效应 (autonomy)、以及省音效应 (reducing effect) 这三大效应。其中的自治效应“指某一语言序列由于重复地、机械地记忆，最后在使用时与其构成单位脱离联系，达到高度自治化，脱离词源成为独立的语言单位”。虽然自治效应主要发生在词的派生过程中，不过习语和短句也这样。

交际是会话参与者双方的行为，语境的提供也是双方的，因此构式语义的成功传递和解读缺一不可。交际语境不仅对同形的两个构成如何进行选择影响较大，对于单一构式的运用也产生影响。

3.3 虚拟与真实的转换

语言本身与客观事实并无直接关系，命题的真伪并不影响句子本身的成立。正因为如此，作为一种交际策略，发话人说的有时候可能是与事实有一定出入的内容。不过依据会话原则，对话顺利进行的条件之一就是要求信息的真实性。³⁾那么，通常听者也会将对方的话语假定为真实命题来接受。在这样合作的前提下，发话者如果有意图地利用听者的心理假定，就有可能利用语境提高发话内容的真值度。

以构式 [我正想 VP 呢] 为例，来看看在交际策略指导下的实际运用。

9) 甲：啊呀您自己走回来啦？我正想去接您呢！

乙：没事儿，走走也锻炼身体。

10) 甲：喂，田老师吗？我文文啊，明天的时间定了吗？

乙：不好意思，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明天我有事儿，去不了了。

11) 甲：田老师！田老师！太好了，我正想去找您呢！

乙：是吗？那去我研究室吧。

场景 9) 10) 都是对方实际上已经完成相应行为 (回家 / 打电话)，甲在发现事实后用 [我正想 VP 呢] 来为自己辩解。按照字面的组成来看，语义仅限于说话人正在考虑实施某一行为，并未涉及什么时候实际行动开始。不过，按照中文使用者的通常思

3) 指会话原则 (principle of conversation) 中的质量原则 (the maxim of quality)。

维模式，正在进行准备就意味着下一步就会实际行动，比如中国客人看到日本饭馆门口有“准备中”的字样，往往会按照中国人的思维理解，认为马上就会开门营业，就会在店门口站着等候。那么同样的，正在考虑这个行为就意味着实际行动也会在非常近的未来时间内进行，这样一来整个构式就成了一个说词，表示自己马上就会行动，只是稍晚了一步而已。这个时间差不仅是想法与行动的差，更重要的是指向对方的行为完成时间与说话人动作开始时间的差。实际上，发话人在使用[我正想 VP 呢]构式时存在一个预设，即对方行为的完成时间晚于自己的动作开始时间。具体说预设的顺序是 {准备行动 → 实际开始 → 对方接受}。季安峰（2015）在对各家观点进行分析综合的基础上，兼顾语义预设和语用预设，对预设定义为“预设是说话人说出某句话时主观认定不言自明的共享知识或背景信息，是一句话得以恰当表达的适宜性条件。”也就是说，发话者认为所面临的语境是最适合所使用的语句的。拿例9)和10)来说，说话人使用这个句子的最适合语境应当是自己的行为按照预设发生在对方行为之前。可事实上使用这个语句时却被对方行为抢先了。这样一来，所用语句失去了原本最适当的语境，而发话者仍然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其目的就是向对方传递自己原本的预设，说明语境变化并非其本义，是出乎意料的，从而为自己的失礼而找到说词。至于发话人是否真的有实施行动的打算，则与语句本身并不相干。而听者往往也会遵循会话的合作原则，完全接受了发话人的辩解，如场景9)的乙转而安慰甲。即使是场景10)那样电话打晚了而且又取消了原定计划，但听者也会接受[我正想 VP 呢]构式的语义传递，接下去也用类似“那太遗憾了，没事儿”这样的话语完成表示理解的应答。由于会话双方的共同合作，虚拟的预设得以转为真实，从而达成了申辩和谅解的信息传递。

当然，[我正想 VP 呢]构式所包含的预设与事实相符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比如在场景11)，路上恰好碰到了要找的人，虽然还没到目的地，但是去找这个人的行为已经开始实施，符合预设的时间顺序。不过，发话人也可能是偶遇对方，原本并没有去找他的打算。只是由于客观上见到了对方，跟接人和打电话的行为性质不同，完全可以把现在的行为解释成原本就有的计划。类似的还有下边儿的场景：

12) 甲：有学生要补考怎么办？

乙：我正想说这事儿呢。有医院证明才能同意。

虽然对方先提到相关话题，但乙接下来提供了有关信息，以事实行为证明其行为步骤符合[我正想 VP 呢]构式的预设。基于对他人思维无法验证的先决条件，即使也许真的情况是对方不问就不会说，但省力原则在这里也发挥作用，使双方不再纠结话语背后的真实性，从而使甲乙达成共识，谈话更顺畅地进行下去。

预设对语境的适当性要求，使构式在发话者的使用意图下成为有效的交际策略。构式[我正想 VP 呢]的语用情况说明，发话人具有明确的情报意图(informative intention)，想让对方理解自己的计划打算，不管是否事实上是否实施。可以说，构式本身并没有因语境而发生变化，而是说话人改变了构式与语境的适应性。

4. 结语

以上分析说明，语境对构式语义的形成和会话中的最终实现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词组、习语和句子的构式义在高度固化之后，依然需要语境凸显其与原型字面语义的不同，同时发话者也可以利用语境与构式语义的匹配性，有意图地使之作为有效的交际策略来表达合作或不满。

参考文献

- 盖淑华 2011 <语言输入中的语符频率与语类频率 - 认知语言学视角>,《中国英语教育》第 1 期
- 过国娇、陈昌来 2016 <“一 +M 借 +VP”构式的语义分化、认知动因与语用功能分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 3 期
- 郝瞰 2018 <论元结构构式在汉语母语者与二语学习者句子理解中的作用>,《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 季安峰 2015 《汉语预设触发语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王晓辉 2018 <习语构式的动态浮现 - 由程度评价构式“X 没说的”说开去>,《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

吴为善 2016《构式语法与汉语构式》, 学林出版社

コリン・イテン著 武内道子、黒田尚彦、山田大介訳 2018『認知語用論の意味論—真理条件の意味論を超えて』ひつじ書房